

“说部”之概念辨析*

王 炜

【提要】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王世贞创制了“说部”一词。明清时期，“说部”这个概念形成了特定的自洽性和有效性，它自身也蕴藏着被突破、被重新界定的可能性。“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差异与断裂。这种差异既是“说部”与“小说”区隔开来的标志，同时又成为它们彼此融会、相互趋赴的内在动因。到了近代，“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指称的知识实体在类例建构、质性特征、体式规范上完全交叠、重合，孳衍出近现代中国小说观念基本的构造形态。从明代中后期至近代，“说部”这个概念及其指称的知识要素以其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和发展逻辑，影响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嬗变。

【关键词】“说部” “小说” 小说观念 类例建构 质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102-09

“说部”一词出现于16世纪后期，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厘清这个概念生成与变化的过程，有助于我们把握明清时期小说观念的发展与演变。刘晓军的《“说部”考》一文从近现代定型的小说观念入手，“考索‘说部’源流”，^①这在“说部”的概念研究方面实有开创之功。在刘晓军提出的相关论断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关注历史细节，立足于明清时期文人的知识架构，厘定“说部”概念指称的知识实体的情况，梳理“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之间并行交汇、相互渗透的多重关联。

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王世贞在整理、编订自己的诗文集时，创制了“说部”这个概念。王世贞将其诗文集命名为《弇州四部稿》，所谓“四部”即“赋、诗、文、说为部四”。^②王世贞

多次用到“说部”这个词。他写信给徐益孙等人说：“秋来校正拙集鱼豕之误八百余字，增入说部六卷”；^③“弟校集凡赋、诗、文、说部将百三十万言”；^④“聊上说部一种之半”。^⑤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

① 刘晓军：《“说部”考》，《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② 王世贞：《徐孟孺·又》，《弇州山人续稿》卷18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3页。

③ 《徐孟孺·又》，《弇州山人续稿》卷18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613页。

④ 王世贞：《张助甫》，《弇州四部稿》卷1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5页。

⑤ 王世贞：《陈玉叔》，《弇州山人续稿》卷18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94页。

王世贞拎出“说部”这个词语，目的是创制出一个与“小说”具有并行关系、同时又相互补充的概念。“说部”与“小说”指称的对象及其功能、价值并不具有天然的对等性与同一性。我们甚至可以断定，王世贞创制“说部”这个概念的目的正在于，有意识地把特定类型的知识要素与“小说”区隔开来。

王世贞本人没有系统地论及小说，但是，王世贞极为推重的胡应麟曾对小说进行细致探讨。胡应麟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胡应麟对小说的分类为参照，我们可以看到，王世贞创制的“说部”笼括了胡应麟所说的杂录、丛谈、辨订这三种类型。《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九至一七四为说部，包括六个知识单元：《劄记内篇》、《劄记外篇》、《左逸》、《短长》上下、《艺苑卮言》及附录、《宛委余编》。《劄记内篇》《劄记外篇》“内多传经，外多传史”，^①可归入丛谈。《左逸》及《短长》叙录《左传》、《战国策》的逸文，可归入杂录。《艺苑卮言》首先叙录诸家诗论，这是杂录；继而辨析诗文的体式，梳理从《诗经》到明代诗文的发展演变，这是丛谈。《宛委余编》辨析、考证诗文中涉及的名物、事件等。以上内容或涉辨订，或系丛谈。这样，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划定的“说部”实际上是将胡应麟所说的志怪、传奇以及箴规切割出去，保留了杂录、丛谈、辨订三种类型。

王世贞创制的“说部”在实体形态、质性特征等层面上与明代中后期人们谈到的“小说”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从指称实体的形态上看，“说部”主要是评论、谈说、杂录，这些知识要素能且只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相较而言，“小说”既指称文字形态的知识，也可以用来指称口头形态的作品。

在《弇州四部稿》中，“说部”的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中国知识体系架构下的四部，其实质是对书籍、对以文字留存的知识进行分类。《弇州四部稿》使用“说部”这个概念把《劄记内篇》《劄记外篇》等知识单元整合、封装于一体。这些单元各自的内容非常明确，知识单元之间的排列也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

结构，它们的位序是根据经、史、子、集这一主流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排列的。“说部”的特点是，散论、杂论、漫论经史子集各部书籍涉及的某些问题，然后用文字的形式把个人的思考和认识记录下来。

“小说”一词主要用来指称以文字形态留存的知识，但也可以含纳口头作品。“小说”这个词语在《弇州四部稿》《弇州山人续稿》《弇山堂别集》中共出现 28 次。其中，有两次是指口头形态的“小说”。一是《戏赠朱生》说道：“暑候平原侯，跳丸方小说。顷刻数千言，斜阳尚林樾。”^②二是《前翰林编修文林郎含斋曹公墓志铭》谈到，曹大章“令左右时奏伎，或诵俳优小说、蒲博，呼笑闾杂”。^③王世贞使用“小说”指称口头形态的作品，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事实上，自汉魏一直到明清，“小说”这一概念始终不排斥口头形态的作品。如三国时，邯郸淳“诵俳优小说数千言”；^④到了宋代，“小说”也是说话中的一家。明代时，人们继续使用“小说”一词指称口头形态的作品。韩邦奇比王世贞年长 53 岁，他在《踏莎行·于少保石将军》自注中说：“小说家编成《石家词话》，优人唱说。”^⑤虞淳熙年轻时曾得王世贞的提携。虞淳熙说自己“始目不识丁，倾耳听唱小说”。^⑥稍后的何白、袁中道等人也说：“闻市井人唱乐府小说”；^⑦“听一瞽者唱《四时采茶歌》，皆小

① 王世贞：《劄记内篇·题记》，《弇州四部稿》卷 13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1 册，（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82 页。

② 王世贞：《戏赠朱生》，《弇州山人续稿》卷 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2 册，（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263 页。

③ 王世贞：《前翰林编修文林郎含斋曹公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 9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83 册，（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83 页。

④ 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 21，中华书局 1964 年版，第 603 页。

⑤ 韩邦奇：《踏莎行·于少保石将军》，《苑洛集》卷 1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69 册，（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45 页。

⑥ 虞淳熙：《与王弘台宪副》，《虞德园先生集》卷 25，明末刻本。

⑦ 何白：《丘雨川先生传》，《汲古堂集》卷 26，《四库禁毁书丛刊》第 177 册，北京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34 页。

说碎事”。^① 这些借助于声音呈现的内容可以归入“小说”这个范畴之内，但却不能归于“说部”之中。

从语体形态上看，“说部”仅指文言作品，而“小说”则兼及白话作品。《弇州四部稿》中的“说部”共有36卷，全部是以文言的形式散论经、史、子、集四部中的相关问题。明代中后期，以文字留存的白话形态的作品虽然已经颇具规模，但是这些书籍还未跻身进入四部分类法这一主流知识体系的建构之中。王世贞创制“说部”，并有意阻断了这个概念与白话作品之间的关联。相比之下，“小说”这一概念则可以笼括白话形态的文本。“小说”指称的对象不仅包括志怪、传奇、丛谈等文言形态的作品，人们还用这一词语指称白话形态的《三国演义》等。比王世贞年长5岁的徐渭说：“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② 稍后，袁中道、金声等也谈道：

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③

材官万民安、承差郑天卿所砌一段，与俗所传《水浒》、《西游》诸小说何异？^④

“小说”这个概念主要用来指称位居于子部的、文言形态的知识要素。但是明代中期以后，在日常的语境中，这个词用来指称白话形态的作品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从知识要素的质性特征上看，“说部”在体例上的核心特质是“论”，主要是表达个人的看法。个人观点只有对错之分，而不存在虚实的问题。如果一定要用对错、真假这样的标准来规范“说部”的内容，“说部”包含的要素往往是趋向于真实的。如，王世贞论及陈嘉谟的行实时用到“说部”一词。王世贞谈道：

公凡一典文衡，三领佐南北成均，意必得真材以需世用。故谆谆然所提耳而诲之者，无匪近里敦行之学，具载诸说部中。^⑤

王世贞对陈嘉谟尊崇有加，他将陈氏的事迹事功载录在“说部”之中。由此，我们可以窥见王世贞对“说部”的态度。那就是，“说部”收录的内容是趋于真实的、严肃的。相比之下，“小说”则具有虚妄、怪诞的特点。王世贞用到“说部”一词，往往直指小说内容的妄诞、不实。他说：

小说云蹇夏二杨皆有赐，不可考矣。^⑥

小说乃云刘公得石匣兵书，乃瞽史词话以欺愚人。^⑦

宋时一小说，云是哲宗送大将征夷……然哲宗事亦不足信。^⑧

在王世贞的观念中，“小说”的特点是虚实参半、虚实无定，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多地偏于虚诞。这与明代中后期人们的小说观念是一致的。如徐渭说：“《三国志》小说……如所谓斩貂蝉之类，世皆盛传之，乃绝无有此。”^⑨ 谈迂也说：“小说家宋包孝胥事，多依托鬼神，想此亦传闻之类。”^⑩

明代中后期，知识要素的数量、形态、规模迅速扩充，知识体系正酝酿着整合和重置。

① 袁中道著，钱伯诚点校：《寿大姊五十序》，《珂雪斋集》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

② 徐渭：《吕布宅（有序）》，《徐文长逸稿》卷4，《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85页。

③ 袁中道著，钱伯诚点校：《游居柿录》卷9，《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6页。

④ 金声：《与史大司马》，《燕谄阁集》卷5，《四库禁毁书丛刊》第85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⑤ 王世贞：《念初堂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4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51页。

⑥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赐免死诏》，《弇山堂别集》卷1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1页。

⑦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史乘考误二》，《弇山堂别集》卷2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80页。

⑧ 王世贞撰，魏连科点校：《史乘考误八》，《弇山堂别集》卷27，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7页。

⑨ 徐渭：《奉师季先生书》，《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7页。

⑩ 谈迂撰，张宗祥校点：《国榷》卷7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66页。

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试图重新区划知识的界域。王世贞谈到自己将文集命名为“四部稿”的缘由，他说：“集所以名四部者，……亦七略遗例也。”^① “七略”的目的是“所以分书之次”，^② 即对知识要素进行归类。《弇州四部稿》仿照七略“分书之次”的做法，清晰、明确地区划出“说部”特有的界域。“说部”作为一个新生的概念，与“小说”这个既有的概念在指称的知识要素上存在着大面积的交集，它们是相互交错但又不完全重合的。

二

“说部”是王世贞创制的全新词语。在《弇州四部稿》中，这个词语也同步成为指称极其明确的概念。一个概念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是天然生成、必然如此的。“说部”能否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概念、它单方面划定的与“小说”之间的界限是否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得到确认。

概念的创生与概念的有效性，是既有关联又不完全等同的两个层面。某个概念及其原生内涵必须在现实实践中建构起稳定的、极其牢固的对应模式，才具备初步的现实有效性。在《弇州四部稿》刊刻之后，“说部”这个概念随着王世贞的声名和影响迅速扩散开来。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这个词语，确认了《劄记内篇》《艺苑卮言》等与“说部”概念之间的关联。如骆问礼提到“王凤洲说部”，^③ 明末的刘城说“多读王家说部书”。^④ 还有人创制了“弇州说部”一词。明末清初，“弇州说部”一词在张自烈的《正字通》中出现两次，在汪道昆的《太函集》、孙矿的《居业次编》、孙能传的《剡溪漫笔》、吕一经的《古今好议论》、徐枋的《居易堂集》、范方的《默镜居文集》中各出现一次。钱谦益的《绉云楼书目》在著录书籍时，也直接使用“弇州说部”一词标明王世贞的系列作品。这种单纯的重复看似缺乏创造性，但是它在实践中产生了强大的功能。考虑到从未出现过“弇州小说”这样的说法，《劄记内篇》等也从未与“小说”这个概念关联起来，

我们可以说，在“弇州说部”这样的表述方式不断重复的过程中，王世贞的《劄记内篇》等与“说部”之间不再是简单地衔接、并连，它们之间生成了历时态的、稳定的、甚至是对应的关系，建构起严密的、有效的连接。

明清之际，“说部”一词并没有仅仅用来指称王世贞的作品，它与人们重新划定知识界域的潜在需求完成了即时对接，迅速地从两个向度着手拓展自身涵盖的领域，确认自身的普适性。首先，“当下”诸多新生的知识要素直接归入“说部”这一概念范畴之下。“说部”这个词一问世，就获得了极高的认同度。明清之际，人们在日常写作中常常使用这个概念指称自己的或者友朋的著作。经由这种重复，多部文本被植入“说部”这个概念范畴之下。如邹迪光编订的《文府滑稽》“分文部、说部二目”。^⑤ 范允临将夏树芳的《词林海错》归于“说部诸书”。^⑥ 明末清初，徐枋在《读史杂钞序》中说：“升庵别集、弇州说部衣被天下。”^⑦ 他还表明，自己创作《读史杂钞》实是接续了王世贞“说部”的路向。清代初年，“说部”这个概念的稳定性进一步得到强化。陈维崧将汪琬的《说铃》、宋荦的《筠廊偶笔》置于“说部”之中。金堡、周亮工等都使用“说部”一词指称自己的著述。王士禛也将自己的《居易录》《池北偶谈》《皇华纪闻》《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归入“说部”。从明代后期王世贞的《劄记内篇》《艺苑卮言》到清代前期王士禛的《池北偶

① 《徐孟孺·又》，《弇州山人续稿》卷18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613页。

② 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804页。

③ 骆问礼：《父子状元》，《万一楼集》卷53，《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7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页。

④ 刘城：《李善承元胤罢太仓司训归里》，《峰桐诗集》卷9，《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2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663页。

⑤ 永瑆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3，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54页。

⑥ 范允临：《词林海错序》，《输廖馆集》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1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⑦ 徐枋：《读史杂钞序》，《居易堂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

谈》，相关文本迭次产生、出现，被纳入“说部”的范畴之内。“说部”这个概念也完成了实际的传递，确认并强化了自身普遍的有效性。

其次，人们重新规整前代产出的、既有的知识要素，将原本归置于小说或其他相关类别中的知识要素提取出来，纳入“说部”之中，建构“说部”的历史，厘定“说部”的源流变迁。“说部”这个词语在刚刚萌生之时，它指称的是零散的知识要素，这些知识要素之间尚未形成内在的、结构性的关联。明代末年，人们开始以“说部”这个词语为中心，统理前代生产的知识要素。陈弘绪把宋代的《梦溪笔谈》等归入“说部”之中。陈弘绪谈道：“说部诸书如沈存中《梦溪笔谈》、洪容斋《随笔》、王伯厚《困学纪闻》，博极载籍。”^①徐钊、计东等人进而将“说部”的源头不断向前代推演。徐钊说：“说部之书古今不下数十百种，而临川刘氏所撰《世说新语》为最著。”^②计东谈道：“说部之体，始于刘中垒之《说苑》、临川王之《世说》。”^③乾隆年间，沈德潜也论及“说部”：

说部之书，昉于宋临川王《世说新语》。后，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白居易《六帖》继之。而宋代《太平御览》……尤称一代大观……其后，家自为书，莫能胥举，惟南宋《容斋随笔》有关实用。至我朝顾宁人《日知录》综贯百家，上下千载。^④

沈德潜等人确认的“说部”的具体类别不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要注意的，沈德潜清楚地判定，“说部”的书籍在数量上的“莫能胥举”，这申明了“说部”作为一个概念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可扩容性。另外，沈德潜立足于特定的时间点，将魏晋南北朝的《世说新语》一直到清代的《日知录》《说铃》等一同纳入到“说部”这个概念之下。这意味着，“说部”作为一个概念，它的规范性在时间的推移中始终保持着有效性。这种规范性不仅指向王世贞的系列著作，也可以涵盖前朝的作品，同时，还能够容纳明末以后新生的、海量的知识要素。

这样，计东、沈德潜等人梳理“说部”的源流变迁就不再仅仅是对书籍进行线性的排列，而是清晰地确认了“说部”指称的知识要素作为一套知识序列所具有的连贯性、延续性以及内在的结构性。无量数的作品被纳入“说部”这个概念之下，形成了具有特定内在结构的知识共同体。“说部”发展成为一个常用的专有名词、成为一个稳定的概念。

再次，“说部”这个概念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还在于，明代末年到清代前中期，人们在反复借用王世贞创制的“说部”概念时，也延续着王世贞对这个概念的界定，认同“说部”与“小说”之间的差异。从《说苑》到《世说新语》，再到《梦溪笔谈》，直到清代的《日知录》等，这些作品都与《弇州四部稿》中的“说部”有着共同的特点。它们在体式上均为散论、漫谈、杂录，“或摭据昔人著述……或指斥传闻见闻之事”^⑤；在内容上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明末，李如一编《藏说小萃》，参仿了王世贞将《艺苑卮言》《宛委余编》等诗论著作纳入“说部”的体例。《藏说小萃》不仅收录了“汤大理之《公余日录》、张司训之《宦游纪闻》、张学士之《水南翰记》”，还辑入了“朱太学之《存余堂诗话》”。^⑥之后，纪昀等人沿着这种归类逻辑，将那些书写体例不甚严密、漫论或杂论诗文的著作并入“说部”。如《四库全书总目》说：“宋时说部诸家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梦弼《草堂诗话》、魏庆之《诗人玉屑》。”^⑦四库馆臣还认定，王士禛的《渔洋诗话》“实兼说部之体”。^⑧高阜把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

① 陈弘绪：《寒夜录》下卷，清抄本。

② 徐钊：《史话序》，《南州草堂集》卷20，《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③ 计东：《冬夜语儿笺记序》，《改亭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④ 袁栋：《书隐丛说序》，《书隐丛说》，清刻本。

⑤ 《冬夜语儿笺记序》，《改亭文集》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08册，第91页。

⑥ 陈继儒：《藏说小萃序》，《陈眉公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3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7，第1798页。

⑧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96，第1793页。

归入“说部”，他认为，这部书系“明道之书也”，^①包含着天地间的至理。周亮工也将“说部”与经部书籍并称，他说：“凡九经古文及峒嵎石鼓诸碑莫不取而较勘之，下至志林、说部之编，苟有资于采佐，不之弃也。”^②相较之下，“小说”这一概念则负载了多重的、多向度的价值判断。人们谈到“小说”，有时会赋予“小说”正面的意义和价值，但有时也会直接对这类知识要素给予否定。如，骆问礼谈到，县学诸生“惑于外家小说，漫费妄作”；^③徐枋也警戒门生说，不能被“杂家小说之荒忽”所迷惑。^④

明末清初，虽然“说部”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远远低于“小说”这一既有的概念，但是很显然，这个刚刚创生的、全新的词语，快速获得了较高的认同度。人们在日常书写中不断重复着“说部”这个概念，并围绕着这一概念原初的内涵和外延对相关的知识要素进行规整，强化并固化了“说部”这一概念的稳定性。“说部”这个概念之下聚集的知识要素不断增加，形成了具有内在连贯性、同一性的知识序列，划定了自身特定的界域。

三

概念的传播、延续并不是亦步亦趋地依照原初设定的路向前行。任何一个概念在萌生、确认、定型的同时，它自身就蕴藏着被突破、被重新界定的可能性及内在动力。在明代后期到清末的三百余年里，“说部”与“小说”之间的差异与断裂，既是这两个概念区隔开来的标志，同时又成为它们彼此融会、相互趋赴的内在动因。到了近代，“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完全交叠、重合，孳育了近现代中国小说观念基本的构造形态。

王世贞创制“说部”的本意是，将志怪、传奇切割出来，标注出“说部”与“小说”之间的差异。但是，“说部”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和它与诗部、赋部、文部的关系不同。王世贞创制的“说部”与赋部、诗部等是平行的关系，它们各自包含的知识要素是互斥的；相

比之下，“说部”与“小说”之间则是并行的、交错的关系，它们笼括的文本范例存在着大面积的套叠。这些交错、套叠着的知识要素在“说部”与“小说”之间建构了巨大的、内在的张力，促使“说部”在延续的过程中形成了两条看似背离，实则平行发展，最终合并、融会的途径。一方面，“说部”守持着王世贞最初确认的建构逻辑，标明了自身与“小说”之间的断裂和差异；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断地扩容、转换，将原本归属于“小说”的文本类型吸纳进入自身的范畴之内。“说部”在类例建构上逐渐趋同于“小说”这一原生的概念。

“说部”与“小说”存在着部分的交错、叠置，界限的模糊赋予了这两个概念相互趋同的可能性。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可以根据个人的理解，将相关的或者相似的知识要素随意地投掷于这两个概念范畴之内。“说部”与“小说”之间的区隔也逐渐淡化，乃至湮废。在“说部”持续传播、不断重复的过程中，它曾经排斥的传奇、志怪等类型的知识要素聚拢到这一概念之下。范允临是王世贞同邑的后辈，他比王世贞年少32岁。范允临将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植入“说部”之中。他说：

说部之书……庶几《酉阳杂俎》或可荐之几筵，而《诺皋》等篇则又怪怪奇奇。^⑤

《酉阳杂俎》是“志怪小说之书”。^⑥《酉阳杂俎》中有《诺皋记》《支诺皋》，系段成式“览历代

① 周亮工：《书影序》，《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② 周亮工：《广金石韵府序》，《赖古堂集》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23~624页。

③ 骆问礼：《诸暨县重修儒学序》，《万一楼集》卷31，第187页。

④ 徐枋：《师说上》，《居易堂集》卷9，《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⑤ 《词林海错序》，《输廖馆集》卷2，《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1册，第235页。

⑥ 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怪书，偶疏所记”而成。^①到了清代，志怪、传奇等类型的文本源源不断地涌入“说部”这个概念范畴之下。如，朱彝尊、卢见曾等人谈道：

唐《集异记》旗亭画壁一事……逸于正史而收之说部。^②

朱藏一编《紺珠集》，陶九成编《说郛》，皆千百而取一，说部之完书存焉者寡矣。^③

范允临等人把志怪、传奇置于“说部”这个概念之下。我们无法清楚地确认，他们是刻意地要模糊“小说”与“说部”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还是偶然间推动了“说部”这个概念在范畴上的突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明清两代志怪、传奇等类型的作品归拢到“说部”这个概念之中，没有遭遇任何阻力或者是质疑。志怪、传奇自如地融进“说部”这个新生的概念范畴之内，与辨订、丛谈等形成毗邻的关系，“说部”在基本的类例建构上与“小说”形成了同一性。“说部”这个概念包容了它自身曾经排斥的知识类型，最终完成了自反的过程。

这种自反不仅表现在“说部”笼括的类例的变化，同时，“说部”这个概念对应的质性特征也完成了遽变。志怪、传奇等呈现的“怪”、“异”、虚诞等特点发展成为“说部”的核心特质。

王世贞把传奇、志怪排除在“说部”之外，原因在于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具有“怪”、“异”的特点：

小说有《齐谐记》，见《庄子》“齐谐志怪者也”；《虞初志》，虞初，汉武帝时小吏，……采访天下异闻；《夷坚志》，出列子云“夷坚闻而志之”。^④

明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同“小说”具有“奇”、“怪”、“异”等特质。如，《山海经》“主记异物”、^⑤“偏好语怪”，^⑥胡应麟将小说的源头追溯至《山海经》。“小说”的“怪”、“异”以

及因“怪”、“异”而产生的虚诞、不实，这正是王世贞创制“说部”时极力拒斥的。但是，明末清初随着志怪、传奇等文本类型的不断融入，“说部”的质性特征也在逐渐演化。清代初年，奇异、虚诞、荒怪这样的质性特征与“说部”建立起了直接的关联。如张埏说：“近今盛说部，寓言多荒唐。”^⑦之后，翁方纲、桑调元等都谈到“说部”涉及“怪”、“妄”的问题：

近日王渔洋于说部分四目。谈故、谈献、谈艺皆吾所取也，谈异则吾不欲闻之。^⑧

经史子集列四库，祸首说部标《郛》、《铃》。嚙言日出骋幻诞，辄指故实欺聋盲。^⑨

翁方纲等人对“说部”呈现的“怪”、“异”的风格给予了否定性批评。评判某种风格类型着眼于静态的文本批评，讨论某种风格类型与特定概念范畴的关联则着眼于动态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它们分属完全不同的逻辑层面。翁方纲等人对“说部”所具有的“异”、“幻诞”等的批评，强化了“怪”、“异”等质性特征与“说部”这个概念之间的关联关系。“怪”、“妄”等曾经被“说部”排斥的类型特征发展成为“说部”的典型特质。

明清时期，“说部”这个概念处于不断重构

① 《诸皋记上》，《酉阳杂俎》，第127页。

② 卢见曾：《旗亭记序》，《雅雨堂集》卷2，清道光二十年卢枢清雅堂刻本。

③ 朱彝尊：《梦梁录跋》，《曝书亭集》卷44，世界书局1937年版，第533~534页。

④ 王世贞：《宛委余编四》，《弁州四部稿》卷15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台）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42页。

⑤ 王充著，张宗祥等校注：《论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页。

⑥ 胡应麟：《三坟补逸下》，《少室山房笔丛》卷3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1页。

⑦ 张埏：《刻书》，《竹叶庵文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页。

⑧ 翁方纲：《濠上迎言序》，《复初斋文集》卷4，《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⑨ 桑调元：《放歌奉赠瞿晴江》，《张甫集》卷16，清乾隆间刻本。

的过程之中。在“说部”与“小说”两个概念相互参照、相互对应又相互趋迎的过程中，它们指称的知识要素在基本体例上也逐渐趋于同一。

“说部”在体例上的原初特征是“偏载琐述”，^①“以零星杂语为书”，^②表达的是个人的思想观念。明代前期，吴讷谈到“说”之体式、特点，“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③王士禛在论及“说部之书”时，^④也重申了“说”的体式特征。到了清代，“说部”一方面依然保持着原初的体例特征，另一方面它也融入了新的书写体式。如徐枋将“说部”“分为二种：一曰杂钞，一曰稗语。稗语以纪异事，杂钞以纪奇字也”。^⑤“杂钞”主要是表达个人的思想观念，对世事、事物的认知和理解；“稗语”则是“纪异事”。这样，“说部”在以论说为基本体例的基础上，融入了叙事的内容。到了清代后期，孙原湘清楚地划定了“说部”包含的这两种体例。他说：“年来说部竟如麻，庄语谐词各一家。”^⑥“庄语”大体指向的是丛谈、辨订、杂录等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的知识类型，这是论说、是述己意；“谐词”则泛指那些以娱乐为主旨的作品，包括志怪、传奇等，这偏于叙事、是“纪异事”。王世贞曾经有意识地将“庄语”、“谐词”界分开来，清人则对这两种知识要素进行了重新组合，将它们封装于“说部”这个概念之下。到了近代，人们更进一步将白话形态的叙事作品移植到“说部”这个概念中。如陆以湑等人谈道：

《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⑦

世传说部有《花月痕》一书。^⑧

《红楼》《水浒》《三国》《西游》，凡有说部，堆枕盈褥。^⑨

“说部”与叙事类的作品，包括与长篇白话小说之间的连接由最初的断裂、错位突变为接续和贯通。“‘说部’最终成为小说的同义词”，^⑩无论是在质性特征上还是在指称类例的基本形态上，都获得了与“小说”的一致性。

谈到“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之间

最初的差异与最终的合流，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小说”这个概念有着悠长的历史，是中国书籍分类体系中的专业术语；“说部”只是一个新生的专有名词，“说部”的稳定性看似远远地弱于“小说”。但是，“说部”与“小说”的日渐趋同，并不是“说部”单向性地移动或趋附，也不是“说部”单方面地被改造。“说部”原生的质性特征也渗透到“小说”这个概念之内，从根本上改变了“小说”的形态与性质，推动着“小说”这一术语完成从传统到近现代的延续和转换。

首先，“说部”的出现促成了小说与诗、文的对接。在四部分类法下，“小说”是子部之下的二级类目，诗、文、赋等或是集部包含的知识要素，或是集部之下的类目。“小说”与诗、文、赋无论是在类别归属上，还是在层级定位上都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关联关系。王世贞在编订《弇州四部稿》时，将丛谈、辨订、杂录等作为独立的知识类型，从子部小说中提取出来，与集部之中的赋、诗、文等整合封装。这些知识要素构成了全新的统一体，说部成为与赋、诗、文相互毗邻、有着内在亲缘关系的知识单元。有清一代，在“说部”与“小说”这两个概念融会的过程中，“说部”与诗、文之间的亲缘关系直接传递、转让到“小说”这一概念之

① 谈迂撰，罗仲辉、胡明校点校：《枣林杂俎序》，《枣林杂俎》，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② 骆问礼：《续羊枣集序》，《万一楼集》卷48，第299页。

③ 吴讷著，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3页。

④ 王士禛：《香榭蠹说序》，《带经堂集》卷73，《续修四库全书》第14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⑤ 《读史杂钞序》，《居易堂集》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404册，第148页。

⑥ 孙原湘：《镜花水月题词》，《天真阁集》卷13，《续修四库全书》第148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⑦ 陆以湑撰，崔凡芝点校：《汤火伤方》，《冷庐杂记》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3页。

⑧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2，宣统年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本。

⑨ 黎汝谦：《遣子祭次女兰姑文》，《夷牢溪庐文钞》卷5，《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页。

⑩ 刘晓军：《“说部”考》，《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

下。到了近现代学术体系建构之时，小说与诗、文等构成了有着内在一性和统一性的关联序列，共同成为文学学科核心的构成要素。其次，“小说”承袭了“说部”的基质，到了近现代，它最终将口头形态的作品切割出去，只保留了文字形态的文本。“小说”在几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笼括了多重形态、多种类型的知识要素，这既包括文字形态的，也包括口头形态的作品；“说部”这个概念则明确地剔除了口头形态的作品。随着“说部”与“小说”的共融、合流，“说部”的这一概念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观念的建构。到了近现代学科体系定型之时，“小说”这一概念也转而变为，能且只能用来指称文字形态的作品。

在四部分类法下的“小说”观念向近现代文学学科体系下的“小说”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说部”这个概念的创生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力量，我们也无法对“说部”起到的作用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在“小说”与诗、赋、文聚合成为共同体的过程中，“说部”这个概念的创制以及传播，显然是极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推动力之一。“说部”以自身特有的存在方式和质性特征，影响了近现代的小说观念，推动着近现

代文学学科的生成和定型。

结 语

王世贞创制“说部”的目的是，在“小说”这一原生概念的基础上，重新区划、切割“小说”这个庞大的领域。从明代后期到民国初年，“说部”这个词语盛行一时，“说部”生成了自洽性、有效性、包容性，它也建构起特定的历史性和历时性。由于知识体系内部运移的复杂性、自律性，“说部”最终没有发展成为新的知识类型，没有能够替换、覆盖“小说”这一原生概念。但是，“说部”的创生、“说部”与“小说”从背离到合流的演变过程，清晰地呈现了明清时期“小说”这一传统知识类目酝酿的变动与重构。通过辨析“说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小说观念乃至中国知识统序从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型，是而且首先是本土知识体系自我的需求和内部的突破。

本文作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左杨

A Study of *Shuobu* as a Notion

Wang Wei

Abstrac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ang Shizhen created a new concept which was called *shuobu* (说部), and the new concept was parallel to and in mutual complement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notion of “nove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elf-consistency and validity of *shuobu* were universally identified. Besides, there were lots of possibilities that the notion of *shuobu* was pierc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huobu* and “novel” were not only the symbol of their division but also the stimulus of their confluence. In modern times, the overlapping of these two notions in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reproduced the basic configuration of the idea of “novel” in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Keywords: *shuobu*; novel; the notion of “novel”;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ifi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uobu*